

新區域間主義下的歐盟印太戰略： 以歐盟與東協「開路者」協定為例*

荊柏鈞

倫敦國王學院歐洲與國際研究學系博士候選人

謝笠天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歐盟莫內講座

摘要

隨著近年「印太」成為國際關係與外交研究的重要詞彙，歐盟於2021年4月首次提出「印太戰略」，並特別強調與東協在印太區域合作的重要性。事實上，歐盟自2010年代以來受到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亞洲地緣政治競爭激烈等結構性因素影響，已加速與東協的「第三波區域間主義」（Third Interregionalism）發展；除與東協國家洽簽經濟協定，並於2020年底將原有與東協的對話夥伴關係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本文主張歐盟透過與東協國家洽簽經濟協定以增強其「印太戰略」的效力，而雙邊升級的關係不但強化東協在全球的經貿戰略地位，互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法律架構亦充實區域間主義理論之內涵。本文以歐盟近年與新加坡和越南簽署的「開

* 作者感謝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Erasmus+ Programme）及韓國國際交流財團（Korea Foundation）提供本研究經費補助。作者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建議，以及政大法研所劉芃原同學協助校閱。文中若有疏漏之處，由作者負責。

路者」(pathfinder)貿易及投資協定為例，探討歐盟對東協的經貿戰略布局與實務作法，以及「印太戰略」的思維。在傳統的貨品及服務貿易等範疇之外，本文亦分析歐盟新世代自由貿易協定的元素，包括人權與永續發展、地理標示，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規範。整體而言，歐盟考量新越兩國處於不同經濟發展狀態，給予越南較多彈性。藉由聚焦歐盟與新越簽署的經濟協定以及和「印太戰略」的關係，本研究解釋歐盟如何在亞洲推動以歐洲規範與價值為核心的經濟協定，並勾勒出歐盟與東協新區域間主義的最新輪廓。

關鍵詞：區域間主義、歐洲聯盟（歐盟）、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印太戰略、自由貿易協定

* * *

壹、緒論

歐洲聯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Council of the EU或歐盟理事會）於2021年4月通過「歐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合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以下簡稱：歐盟印太戰略）的結論，積極加入近年興起、以美國為主的「印太戰略」辯論。這是歐盟首度對印太地區發表共同立場，強調歐盟將在印太地區強化其合作夥伴的角色，以民主、法治、人權與國際法為基礎，促進區域的穩定與永續發展。該文件指出印太地緣政治競爭激烈，除加劇貿易與供應鏈的壓力，也讓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局勢更加緊張。歐盟因此希望透過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角色維護自身利益，並與區域內價值理念相近的夥伴在環境、健康、基礎設施連結及數位化等議題合作（Council of the EU 2021a）。

在歐盟理事會「印太戰略」結論的基礎上，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9月發布「印太戰略」共同通訊（Joint Communication），進一步闡述「歐盟印太戰略」的實質內容。除延續上述歐盟理事會結論的基調，並設定七大優先合作領域，包含永續性與包容性

的繁榮（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prosperity）、綠色轉型（green transition）、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數位治理與夥伴關係（digital governance and partnerships）、連結（connectivity）、安全與國防（security and defense），以及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雖然歐盟版的「印太戰略」相對新穎，但其對貿易與投資的政策內涵，近幾年已成為歐盟對外經濟策略的優先目標。尤其在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的情況下，歐盟執委會認為國際貿易與整合的全球供應鏈為重要的經濟成長引擎，對於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扮演關鍵角色。歐盟執委會因此於2020年提出將採用「開放式戰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政策，希望在開放經濟下追求「戰略自主」，加強歐盟形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並且與各國在多邊與雙邊體系上發展雙贏關係（European Commission 2020a）。

因應亞洲經濟崛起，「歐盟印太戰略」與歐盟執委會2015年發布的「全面貿易：邁向更負責的貿易與投資政策」（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以下簡稱：全面貿易）息息相關。該政策指出亞洲對歐盟經濟利益至關重要，必須要與亞洲發展「戰略接觸」（strategic engagement），並特別強調與中國、日本、南韓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東協或ASEAN）經貿談判的重要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32）。「歐盟印太戰略」更進一步將與東協的接觸列為首要目標（Council of the EU 2021a, 4）。對於亞洲國家來說，考量近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與疫情重創經濟等因素，強化與歐盟的關係也變得更為重要。基於兩區域皆有足夠誘因增進彼此的經貿連結，歐亞雙邊關係與相關的法律架構快速發展，充實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的概念，也凸顯歐盟因素對亞洲區域主義（Asian regionalism）的影響。

2010年以來，歐盟積極與亞洲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在東北亞，歐盟於2010年與南韓簽署FTA（EU-South Korea FTA，以下簡稱：歐韓FTA），並在2018年與日本簽署經濟夥伴協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簡稱：歐日EPA）（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歐盟與中國亦於2020年簽署歐中全面投資協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不過2021年歐洲議會凍結該協定的批准程序，藉此回應中國對歐盟議員的制裁，以及表達新疆維吾爾族人權議題的不滿（蘇卓馨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a）。至於東南亞，歐盟在「全面貿易」中揭示將採取「堆積木」（building blocks）策略，先逐步與東協個別國家簽署協定奠定基礎，以此促成未來歐盟與東協FTA的架構（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2019年生效的歐盟與新加坡FTA（EU-Singapore FTA，以下簡稱：歐新FTA）和2020年生效的歐盟與越南FTA（EU-Vietnam FTA，以下簡稱：歐越FTA），即是實際執行此「堆積木」的方式（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 2021b）。

東協十個會員國多為經濟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因此成為歐盟對亞洲政策的優先對象。作為亞洲重要的經濟區域整合計畫，東協被視為歐盟的「自然夥伴」（natural partner）（EEAS 2013, 1）。經濟上，東協目前排名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與亞洲第三大經濟體，是歐盟在歐洲以外的第三大貿易夥伴（Allurentis 2019, 5;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c）；政治上，歐盟執委會自2019年推出「歐中關係戰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以來，將中國視為提供另一種治理模式的「體制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也因此強化歐盟積極與東協深化關係的動機。2020年，歐盟與東協正式將對話夥伴關係（dialogue partnership）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Council of the EU 2020），歐盟除希望藉此增強兩區域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力道，同時也加強在東南亞區域，尤其是南海的安全角色（Borrell 2020; 2021a; 2021b）。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在2021年訪問印尼時即提到，歐盟不僅要當東協發展與貿易的夥伴，更要在政治與安全領域加強合作。透過「歐盟印太戰略」與剛升級的雙邊戰略夥伴關係，波瑞爾認為雙邊能在印太地區強化連結（connectivity）、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rules-based multilateralism），以及透過區域整合確保歐盟與東協的「戰略自主」（Borrell 2021b）。

於此背景下，歐盟近年與新加坡及越南簽署的FTA和相關經濟協定就顯得格外重要，為歐盟推動「印太戰略」以及與東協的戰略夥伴關係奠定基礎。作

為歐盟與東協FTA的「開路者」(pathfinder)，歐新與歐越FTA不僅象徵歐盟與東協關係進入新階段，也創造區域間主義新的法律模式。歐盟與這兩個東南亞國家談成的架構與承諾，可作為歐盟及脫歐後的英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簽署貿易協定的模板與基準。¹

2020年越南為歐盟第15大貿易夥伴、新加坡為歐盟第16大貿易夥伴，兩國分別為歐盟在東協區域的第一與第二大貿易夥伴，因此皆屬於歐盟洽簽FTA的優先對象(European Commission 2021d)。新加坡不僅是自由貿易港，也是歐洲企業在東協的營運中心；新加坡推行的免稅政策以及缺乏農產品的出口，使其在全世界成為受歡迎的FTA夥伴，並在所有亞洲國家中擁有最密集的FTA網絡。²在東協與歐盟的區域間合作上，新加坡對於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與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均扮演重要催生的角色(Severino 2006)。

越南自1986年革新開放(Đổi Mới)之後，經濟快速成長。近年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許多原本在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加速轉移到越南設廠，以避免美國的額外關稅。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越南與新加坡皆已加入全球重要的兩個巨型區域貿易協定(mega-regional FTA)，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CPTPP)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因此，歐盟與這兩國簽訂FTA，將有助於歐盟企業進入區域供應鏈。

歐盟與新越簽署FTA的差別，反映出歐盟對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所採取的務實彈性作法。由法律角度觀之，歐盟與兩國的FTA應同時與投資保障協定(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以下簡稱：IPA)與夥伴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以下簡稱：PCA)來理解。IPA規

¹ 根據英國脫歐協定的過渡期規定，歐新FTA與歐越FTA在2020年12月31日前仍適用於英國，而英國也在到期前先後與新加坡和越南簽署FTA，讓三國的企業能夠繼續享有與歐新FTA與歐越FTA同等的待遇(European Commission 2020b;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2021;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2020)。

² 截至2021年7月，新加坡已簽署25項FTA(WTO 2021)。

範如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ISDS）機制的投資議題，而PCA作為歐盟與他國簽署FTA的前提條件，著重於促進人權與非經濟議題的合作（European Parliament 2008）。歐新FTA談判過程中原本包括投資保障條文，但該FTA引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運作條約）中關於「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適用範圍的爭議。³ 2017年，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法院）2/15意見書（Opinion 2/15）裁決歐新FTA大部分的規範屬於歐盟「專屬權限」（exclusive competence），但間接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與ISDS機制部分因不屬於「共同商業政策」，歸類為歐盟與其成員國之「共享權限」（shared competence），也因此必須經由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批准才能生效（European Parliament 2017, 2）。⁴

因應歐盟法院2/15意見書，原歐新FTA中涉及投資保障的條文被獨立出來成為IPA（Suse and Wouters 2019）。2019年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批准歐新FTA、IPA與PCA，但IPA與PCA則有待歐盟的27個成員國批准生效（European Commission 2019c）。修正後的歐新FTA因此可被解讀為「歐盟專屬」（EU-only）協定，而IPA與PCA則為「混合型」（mixed）協定（Kleimann and Kübek 2018; UK Parliament 2019）。歐盟與越南已於2012年完成簽署PCA，而後歐越FTA談判跟進歐新FTA的模式，將原來的FTA談判文本分為FTA與IPA，歐洲議會亦於2020年批准這兩項協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9d; World Bank 2020, 20）。此種分流模式確實加速FTA的簽署與批准，因為它避免了少數成員國的杯葛，例如比利時2016年因瓦隆尼亞區反對而延後簽署歐盟與加拿大全面經濟貿易協定（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歐加CETA），以及荷蘭國會2020年通過決議反對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FTA（de La Baume 2016; Leering

³ 關於歐盟「共同商業政策」的討論，可參考吳建輝（2012）與李貴英（2007）等著作。

⁴ 歐盟與新加坡在2013年完成原FTA關於貨品貿易與服務貿易條文的談判，並於2014年完成投資保障談判。

2020)。

本文透過分析歐盟與新加坡及越南簽署的FTA，試圖解釋歐盟近年對亞洲的經貿戰略布局與實務作法，以及「印太戰略」為何強調與東協深化關係的重要性。本文主張歐盟希望透過與東協國家洽簽經濟協定來增強其「印太戰略」的效力，而雙邊關係的升級除強化東協在全球的經貿戰略地位，互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法律架構亦充實「新區域間主義」的概念。歐盟自2010年代以來基於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以及地緣政治競爭等結構性因素，顯著增加東協在其經貿戰略的權重，並從原本較為優越性的姿態轉變為與東協對等互待的心態，以期獲取更多利益，同時促進歐盟與東協「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的發展。歐盟亦藉由推行「新世代FTA」(new-generation FTA)與「印太戰略」，在東協以務實與彈性的方式推廣法治、人權與永續發展等規範與價值。對於東協來說，歐盟積極強化與東南亞區域的經貿連結，有助屬於中小型權力的東協國家在大國競爭環境下執行「避險」策略，以達到擴大利益與降低風險的目的。

本文分為五節論述，第二節將探討區域間主義類型與理論發展，並聚焦歐盟與東協過去四十多年來的區域間架構演變歷程，以及介紹歐盟希望透過與新加坡和越南簽署FTA，進而達到未來區域對區域FTA的「堆積木」策略。第三節檢視歐新FTA與歐越FTA作為「開路者」協定的特徵，並分析東協原產地累積條款、服務貿易，以及數位貿易與電子商務等機制設計。第四節評估歐盟簽署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後的「新世代FTA」元素，側重於人權與永續發展、地理標示、國有企業與政府採購，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規範。第五節總結本文分析與論點。

貳、歐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發展

1980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先後於1980年與1985年與東協和中國簽訂合作協定，初步建立與東亞互動的法律架構基礎。⁵ 過去40多年來歐盟與東亞關係的演變與經驗，對於涉及國際關係與

⁵ 這兩項協定分別為1985年3月7日簽署的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國際法多面向的區域間主義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近年歐盟與新越兩國簽署FTA、與東協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以及發表「印太戰略」，彰顯歐盟最新的亞洲戰略思維，進一步向歐盟執委會設定的「全球領導」（global leadership）目標邁進（EU Mission to ASEAN 2020, 6）。

近年歐盟特別重視與東協的關係，凸顯出歐盟與其重要成員國共同的戰略利益。英國因過去殖民的歷史連結，對於歐盟亞洲政策有較大影響力，但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後，法國、德國，甚至是荷蘭均表現出積極參與亞洲事務的企圖心。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2018年造訪澳洲時，首度提及法國作為印太強權的概念，並表示法澳兩國可作為新印太軸心的核心成員（Doherty 2018）。法國國防部與外交部隨後分別發布「法國印太防務戰略」（France's Defenc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與「法國在印太的夥伴關係」（France's Partnerships in the Indo-Pacific）報告，成為歐洲第一個響應「印太戰略」的國家（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2021; French Ministry of Armed Forces 2019）。德國於2020年發布「德國－歐洲－亞洲：共塑21世紀的印太地區準則」（Policy Guidelines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Germany - Europe - Asia: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ogether）（Germa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20），荷蘭亦於同年發布「強化荷蘭暨歐盟與亞洲夥伴合作的印太準則」（Indo-Pacific: Guidelines for Strengthening Dutch and EU Cooperation with Partners in Asia）（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2020）。此歐盟三國的「印太戰略」，皆支持歐盟與印太國家簽署FTA的目標，並特別強調與東協合作的重要性。

本節透過研析歐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最新發展，來充實相關理論與經驗研究文獻。除了探討「歐盟印太戰略」，亦檢視東協國家在法律與政治上的策略，故避免區域主義研究經常出現以歐洲為中心的問題（Acharya 2009; Söderbaum 2016）。以較為平衡的角度探討歐盟與東協關係，亦能解釋為何近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及1985年9月15日簽署的Agreemen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年兩區域的區域間主義發展，從原本歐盟對東協具有優越性的姿態，逐漸轉換為對等的夥伴關係（EU Mission to ASEAN 2020, 11）。

一、區域間主義類型與理論發展

國際經濟法學並未將區域間主義與區域主義的概念區分，因為兩者均涉及貿易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法律的相容性問題。法律討論主要基於FTA的法律基礎，即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GATT）第24條（Article XXIV）、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第5條，以及授權條款（Enabling Clause）。然而國際關係學在區域主義的基礎上，研究區域間主義的類型與理論架構，試圖解釋區域間主義的型態與動機（Gilson 2020, 730-731）。國關學者定義區域間主義為國家領導的程序，以及特定區域在跨區域架構下彼此間的合作過程（Söderbaum and Van Langenhove 2005）。因此，區域間主義不僅是兩個獨立區域的統合，也重視兩區域經濟與政治領域的互動（Gilson 2002; 2005, 309-310; Roloff 2005）。

區域間主義有不同的類型，最典型的如歐盟與東協FTA純區域間主義架構（Aggarwal and Fogarty 2004）。有別於純區域間主義，跨區域主義（transregionalism）則著重於不同區域間國家與國家的對話過程，例如亞歐會議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在此類對話場域裡，會員國代表在鬆散的區域間架構下討論廣泛議題（Rüland 2005）。除上述兩種類型，亦有混合型（hybrid）或者準（quasi）區域間主義，它是指一個區域與另一區域中單一國家或多國的互動關係（Aggarwal and Fogarty 2004, 5; Hänggi 2005, 40-41; Söderbaum 2016, 177）。歐新與歐越FTA，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與71個非洲、加勒比與太平洋國家集團（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States，以下簡稱：ACP）簽訂的洛美公約（Lomé Convention），皆為此類型的區域間主義。不同的區域間主義類型其實彼此緊密關聯，歐盟與個別東南亞國家簽署的FTA，未來有機會轉化為歐盟與東協的FTA。

基於區域主義的文獻，不同國際關係學派亦試圖解釋區域間主義的動

機（吳東野 2005）。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學派認為隨著區域內或區域間的互賴加深，一些技術性、爭議性低的問題必須由超國家（supranational）機構解決，這些問題也將逐漸「外溢」（spill over）至高階政治領域（Hurrell 1995, 59-60）。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學派同樣聚焦互賴衍生的問題，主張區域間的互賴增加國際合作的需求，並強調規範與制度的誕生將為參與的國家與區域創造更多福利（Hurrell 1995, 61-64; Lenz and Marks 2016, 518-520; Rüländ 2005, 302-303）。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派則認為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是國家在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賽局中採取的一種戰略（Hurrell 1995, 48-49），以求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獲取更多「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對於大國來說，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被視為強化其在國際貿易政治中霸權地位的工具（Lenz and Marks 2016, 517-518）；至於中小型國家則以新現實主義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定義的「平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行為，在區域組織或區域間組織爭取「相對利益」的極大化（Schweller 1994; Walt 1985; Waltz 2010）。

不過，近年一些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的學者認為，東南亞國家在大國競爭結構下的對外行為，不應以「平衡」與「扈從」二分法分類，而是在這光譜間採取多種型態的「避險」（hedging）策略。郭清水（Cheng-Chwee Kuik）主張東南亞國家在追求利益以及降低潛在安全威脅的目標下依賴五種「避險」政策工具：「經濟實用主義」（economic pragmatism）、「約束型交往」（binding-engagement）、「限制扈從關係」（limited-bandwagoning）、「否定主導」（dominance-denial）與「間接平衡」（indirect-balancing）。例如東協國家透過邀請中國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以及與中國建立對話夥伴關係的「約束型交往」方式，來「社會化」（socialize）並約束中國的行為；另一方面，東協國家也採取「否定主導」的策略，納入美國、日本、印度與俄國等強權國家參與東協主導的多邊機制，使中國與其他強權相互牽制（Kuik 2016）。吳翠玲（Evelyn Goh）則定義東協國家的策略為「全面羈絆」（omni-enmeshment），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如區域經濟整合機制與區域間對話平台）與平衡策略，同時以「交往」與「牽制」之形式來處理與強權的關係，進而獲取經濟與安全的最大利益（Goh 2007）。例如新加坡

透過與美國、中國與歐盟等強權簽署FTA，達到分散貿易風險的目的；越南也希望透過與歐盟簽署FTA的這張「歐洲牌」，幫助越南減少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同時增加與美國強化經濟與安全關係的談判籌碼。

有別於新現實主義著重於物質利益，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則主張物質資源唯有透過共享知識的社會結構，才能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的本體論（ontology）而言，不同國家之間具有相互主體的（intersubjective）理解與期望，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會建構出國家的認同（identity）和利益（Searle 1995; Wendt 1995）。因此，建構主義認為國家行為者的觀念、規範，以及認同將決定其在國際場域上對利益的看法與衍生行為（Pacheco Pardo 2009; Wendt 1994）。近年建構主義學派對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的研究，主要著重於認同與規範。例如Amitav Acharya指出，東協的認同奠基於四項法律性規範，包括用和平與非武力方式解決爭端、區域自主與集體自助、非干涉原則，以及偏好會員國雙邊軍事合作、不支持多邊軍事協定。此外，社會性規範也形塑東協的集體認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強調非正式、組織極小化、包容性，以及共識決的「東協方式」（ASEAN Way）（Acharya 2004; 2014）。至於歐洲的區域主義，Ian Manners主張歐盟作為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Europe），是以規範性實力形塑國際體系，而非透過公民權力或軍事權力（Manners 2002; 2006）。最顯著的實例為歐盟藉由對外簽署的經濟協定提倡歐洲價值（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20-23），亦使其在全球規範標準的場域中占有主導地位（Hoang and Sicurelli 2017）。

從規範性權力角度來觀察，歐盟早期對東協提倡「區域複製」（regional replication），希望「出口」自身的整合經驗來提高歐盟作為區域主義模範的地位（Aggarwal and Fogarty 2004, 18-19），不過東協並不接受歐盟「上對下」的態度。東協基於其對國家主權的重視，以及考量區域內多元的種族與文化，從未同意要仿效歐盟成立採用單一市場或關稅同盟的超國家區域組織（Chen 2018, 231-232）。這樣的落差也反映出規範性權力的研究多半以歐洲中心角度出發，其論述多半奠基於歐盟整合的經驗，而缺少對於亞洲區域主義或區域間主義發展的分析與理解（Hurrell 1995, 60; Rüländ 2005, 303）。

在國際關係的文獻基礎上，本文認為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較能解釋歐

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發展。雖然歐盟未成功將東協納為區域主義的「門徒」，但兩區域的互動也強化了東協的集體認同。2010年代以來，歐盟顯著減少「區域複製」的論調、強調兩區域組織是可以相互學習的「自然夥伴」（Chen 2018, 234），並且認定東協為「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更強化了東協的國際地位。此外，如本文接下來對歐新及歐越FTA的分析所示，歐盟透過經濟協定推廣價值與規範的策略上，也採取較為務實與彈性的作法。而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詮釋歐盟對東協戰略的調整，關鍵在於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包括歐盟相對經濟實力的下降、東協經濟的崛起，以及東亞地緣政治的高度競爭。一方面，歐盟在全球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占比逐漸下滑，加上英國脫歐的衝擊，必須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找到新的能量，以及務實開拓經貿道路；⁶ 另一方面，東協崛起也使得東南亞成為美中等強權擴增影響力的必爭之地。東協亦歡迎歐盟增加在東南亞的角色權重，以藉由與更多強權間的互動達到「避險」作用。這些因素均強化歐盟進一步發展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動機，符合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論述。

二、歐盟與東協三波區域間主義進程

（一）第一波區域間主義

如同二戰後三波的全域區域主義發展（張愷致、謝笠天 2020），歐盟與東協的區域間主義也經歷三個重要的階段（Bhagwati 2008, 29-35）。本文定義歐盟與東協的「第一波區域間主義」為1950年代至1970年代間，兩個區域剛開始接觸互動的階段。1958年歐洲六國正式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而1967年五個東南亞國家也創立東協（Hoang et al. 2016）。兩者最早於1970年代接觸，主要原因為東協創始五國，尤其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擔心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會對英國產生貿易赤字與失去他們原本對英國市場占有的貿易優勢，因此希望建立對話機制（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9, 4-5; 1996, 66）。當時東協各國貿易部長在印尼帶頭下，於1972年與歐洲

⁶ 根據PwC預測，2050年歐盟在全球的GDP占比將從近年的15%水準降至9%（PwC 2017, 4）。

對口官員舉行首次非正式會面（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6, 66）。隨後東協成立了針對歐盟的「東協國家特別協調委員會」（Speci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ASEAN Nations），成員包括東協國家的貿易部長與駐歐大使（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9, 5）。1974年雙邊同意設立「東協與歐盟聯合研究小組」（Joint ASEAN-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Group）作為探索合作機會的平台（Nishimura 2017）。197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東協建立對話夥伴關係，且在次年首度舉辦雙邊成員國外交部長參與的部長級會議（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6, 66; Hoang et al. 2016, 13）。雖然「第一波區域間主義」的對話並未帶來重大的實質成果，不過對於組織架構相對鬆散的東協來說，歐盟願意與其制度化雙邊交流，代表歐盟承認東協的談判實力，從新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均為重要的外交突破（Severino 2006）。

（二）第二波區域間主義

1980年簽署的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東協合作協定（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f ASEAN and European Community），象徵第二波區域間主義的濫觴。雖然此協定奠定雙邊在經濟與發展合作上的法律基礎，但協定內文並未納入約束性的議程與機制（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80）。此外，東協不滿歐洲經濟共同體對東協農業與原物料產品所採取的保護主義政策，認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給予東協國家的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generalized scheme of preferences，以下簡稱：GSP）待遇，不及於洛美公約下ACP國家獲取的關稅優惠（Severino 2006, 330）。1980年代，東協國家議會組織（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通過數項決議文，批評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合作協定的進度過於緩慢，並呼籲其「克制採取限制性與單邊性的措施」（AIPO 1983; 1988）。不過，與歐洲議會不同的是，東協國家議會組織或是其於2007年改名後的東協國家議會大會（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Assembly），並無立法或是通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決議案之權力（Rüland and Carrapatoso 2015, 210-211）。

1990年代，歐盟與東協互動的架構則經歷重大轉變。1992年歐洲共同體通過的第443/92號規則，為提供亞洲與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財政與技術支援

建立了法律基礎（Council of the EC 1992）。同年，東協成員國也決定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ASEAN 1992）。1994年歐盟發表的「邁向新亞洲戰略」（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提到，基於亞洲在全球經濟的權重增加，歐盟需與東協國家深化經貿合作關係（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4, 3-24）。

1996年成立的亞歐會議是最顯著的歐亞跨區域對話機制，目前成員包含歐盟、東協秘書處、30個歐洲國家與21個包含東協十國、中國、日本與印度在內的亞洲國家（郝培芝 2004; Severino 2006, 334; ASEM 2021）。亞歐會議最早是由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與時任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於1994年提出（Fitriani 2014, 1-6），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來亞歐會議高峰會成爲歐亞區域間的最高層會議，但過度廣泛的議題範圍，以及亞洲國家多半不願回應歐盟關於人權的問題等，均成該會議的挑戰（Morada 2012, 96）。

（三）第三波區域間主義

自2000年以來，歐亞的「第三波區域間主義」與全球第三波區域主義約在同時發生（Söderbaum and van Langenhove 2005, 256-258），主要關鍵在於WTO杜哈回合談判停滯，世界各國紛紛將重心轉向洽簽區域或雙邊FTA，歐盟也在此趨勢上更加積極地與東亞國家展開經貿談判。⁷ 本文認爲，歐盟執委會將整體亞洲戰略建立在「東協加六」（ASEAN Plus Six）的基礎上，也就是著重發展與東協十國、中國、印度、日本、南韓、澳洲與紐西蘭的關係（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6）。歐盟在2001年推出的「歐洲與亞洲：促進夥伴關係的戰略架構」（Europe and Asia: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nhanced Partnerships）政策，其中包含強化與東協的「新夥伴關係」（new partnership）（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

⁷ 除了歐盟與亞洲的發展，歐盟與ACP國家的區域間架構也產生轉變。1975年簽署的洛美公約，在2000年被強調互惠的科托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暨相關經濟合作協定所取代。不同於被建構的ACP區域以及其權力分散的模式，東協是被定義清楚的區域，尤其在2007年通過東協憲章（ASEAN Charter）後，成爲具有明確法律人格的區域組織。亞洲的崛起也讓歐盟與東協的區域間主義發展，比起歐盟與其他區域如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或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關係，更具有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戰略重要性。

5-21)。2007年，歐盟與東協共同發布「紐倫堡宣言：促進歐盟東協夥伴關係」（Nuremberg Declaration on an EU-ASEAN Enhanced Partnership），進一步提出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發展等合作方向，除勾勒雙邊長期合作的願景，也為區域間關係立下重要里程碑（Council of the EU 2007）。

進入2010年代，歐盟與東協關係加速發展。2012年，歐盟加入東協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成為第一個以區域組織加入該條約的成員（ASEAN 2020b, 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同年歐盟與東協推出「2013-2017斯里巴卡旺市行動計畫」（Bandar Seri Begawan Plan of Action to Strengthen the ASEAN-EU Enhanced Partnership, 2013-2017），具體列出加強歐盟與東協夥伴關係的項目（陳麗娟 2017; ASEAN 2012）。2015年，歐盟執委會發表「歐盟與東協：具有戰略意圖的夥伴關係」（EU and ASEAN: A Partnership with a Strategic Purpose）（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為雙邊升級至戰略夥伴關係鋪路（Chen 2018, 223; Gilson 2020, 728）。該文件特別提到歐新與歐越FTA的進展，將作為歐盟與其他東協國家談判FTA的重要參考基準，並成為雙邊邁向區域對區域FTA目標的墊腳石（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5, 14）。此外，依該政策的建議，歐盟於2015年8月8日東協創立週年日，正式成立歐盟駐東協使館，並派任歐盟駐東協大使（Delegation of the EU to ASEAN 2016）。2017年，歐盟與東協接續「2013-2017斯里巴卡旺市行動計畫」，再推出「2018-2022行動計畫」（ASEAN-EU Plan of Action, 2018-2022）（ASEAN 2017a）。2020年底，歐盟與東協從對話夥伴關係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

2021年，歐盟理事會與執委會前後發表的「印太戰略」文件中，皆特別強調東協在所有印太夥伴中的重要地位。兩者均提到將加強與東協領導的區域組織互動，並且重申支持「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概念，以實現雙邊戰略夥伴關係的各項計畫（Council of the EU 2021a, 4;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5）。在經濟協定上，歐盟認知到CPTPP與RCEP可能為歐盟企業帶來挑戰，因此強調執行歐盟既有與日本、南韓、新加坡和越南等雙邊FTA的重要性，並尋求在印太區域內洽簽更多貿易與投資協定。歐盟「印太戰略」亦特別

提到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為下波簽訂FTA的目標對象。此外，歐盟將持續透過GSP措施，幫助區域內國家消除貧窮與刺激就業，進而融入全球供應鏈，並促進人權的保障（Council of the EU 2021a, 4, 7;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6-7）。整體而言，「歐盟印太戰略」觸及經濟領域的部分，與上述提到的戰略夥伴關係相關文件，以及已達成的歐新與歐越FTA，具有相互增強（mutually reinforcing）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時代推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歐盟印太戰略」較為強調「包容性」（inclusiveness）。川普政府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中，雖提到美國的「印太戰略」不排除任何國家，且仍會尋求和中國合作的機會，但亦直指中國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與「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White House 2017, 25, 45-46），因此較為強調美中在印太地區的「競爭性」，而非「包容性」。歐盟理事會的「印太戰略」文件則使用多次「包容性的」（inclusive）字眼，並延續前述「東協加六」的戰略基礎，強調深化與東協和其他印太地區六國的經濟關係，包括對極具爭議的歐中全面投資協定採取進一步行動（Council of the EU 2021a, 7）。而在歐盟理事會的「印太戰略」文件中，除延續「包容性」的論調，並表示歐中全面投資協定的批准將促進雙方的共同利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7）。的確，歐盟理事會在該文件中強調與理念相近的（like-minded）國家合作，並且提到中國的人權問題，以及南海與臺海的軍事緊張情勢，但仍表明願意與中國發展多面向的互動關係。歐盟官員亦曾表示，歐盟的「印太戰略」並不「反中」（anti-China）（Emmott 2021）。

歐盟注重「包容性」與支持「東協中心性」，其立場與東協2019年推出的「東協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一致。「東協印太展望」具有四大要素：1. 視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為緊密連結的地區；2. 印太地區是互相對話合作，而非對抗競爭；3. 印太地區要共同發展並繁榮；4. 海洋議題在區域架構下具有重要性。在這四大要素基礎上，「東協印太展望」鎖定於海洋合作、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及經濟與其他可能領域加強合作（ASEAN 2019）。上述要素與合作領域凸顯出東協對於「包容性」的堅持，因此和「歐盟印太戰略」較有可能產生協同作用。

至於川普的「印太戰略」，東協對其始終保持模糊態度，畢竟該戰略對於中國的針對性強，強調共識決的東協不願激怒中國（Cook 2021）。再者，川普2017年上任首週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為區域經濟整合帶來不確定性，以及增加川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Shambaugh 2018）。此外，「東協中心性」已可能因「亞太」擴大到「印太」而被稀釋，加上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如將重心放在美國、日本、印度與澳洲組成的「四邊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東協可能逐漸失去對區域議題設定的主導性（Lee 2018, 27-33）。即使在拜登（Joe Biden）執政下，美國對於印太區域的政策仍具對中國的排他性，可能挑戰「東協中心性」與「包容性」原則，並逼迫東協國家選邊站（Frost 2021）。

歐盟加入印太競爭的優勢，在於其在「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發展過程中已與東協建立三大支柱。這三大支柱從2003年起逐漸成形，分別為「歐盟與東協跨區域貿易倡議」（Trans-Regional EU-ASEAN Trade Initiative，以下簡稱：TREATI）、「強化歐盟與東協對話工具」（Enhance Regional EU-ASEAN Dialogue Instrument，以下簡稱：E-READI），以及「歐盟對東協區域整合支援」（ASEAN Regional Integration Support from the EU，以下簡稱：ARISE）。TREATI推動雙邊投資貿易對話，成為兩區域間FTA談判的平台（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18-31）。TREATI亦創造了涵蓋歐盟與兩個以上東協國家的談判機制，⁸ 而該彈性機制也適用於著重發展合作的E-READI（EEAS 2019）。過去40年，歐盟作為東協最重要的發展合作夥伴，即透過E-READI的需求導向平台，針對數位經濟、性別平等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等各主題會議提供後勤支援（EU Mission to ASEAN 2020, 17）。最後，ARISE或是後來升級成為的ARISE Plus，則是歐盟幫助東協推動「東協經濟共同體2025藍圖」（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⁸ 即所謂的「EU + x」對話機制（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31）。

2025)，以及加速區域經濟整合的政策工具。

這三大支柱成爲歐盟推動「印太戰略」、「2018-2022行動計畫」以及2018年制定的「連結歐洲與亞洲：堆積木的歐盟戰略」（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的重要基礎（ASEAN 2017a;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這些計畫皆強調與東協合作強化區域基礎設施連結，被視爲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如同歐盟「印太戰略」強調將確保「高品質的連結」（high quality connectivity）（Council of the EU 2021a, 9），歐盟預期將持續透過重視永續性發展的計畫，來彰顯其與「體制競爭對手」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之處，藉此希望吸引更多東協國家與歐盟合作發展基礎設施。

三、區域對區域FTA：「堆積木」策略

要達成歐盟與東協FTA的終極目標，需要務實的藍圖規畫。如前所述，歐盟採取「堆積木」的策略，試圖要在與個別東協國家簽訂經濟協定的基礎上，最終簽署兩區域間的FTA。「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的發展，仍必須面對全球三大結構性挑戰。

首先，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相對衰減，也改變過往全球貿易的單極治理體系（Krauthammer 1990）。現今全球經濟秩序已逐漸發展成以北美、歐盟與東亞爲主的三元體（Triad）（王啓明 2010）。然而，2017年至2021年初的美國在川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下，除了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亦對歐盟鋼鋁加徵關稅，使得跨大西洋的盟友關係出現嚴重裂痕。雖然新任總統拜登2021年1月上台後，試圖積極修補與歐盟的關係，並於同年6月宣布美歐關稅戰暫時休兵，但仍繼續執行對中國的高關稅措施（Ordoñez 2021）。歐中關係也面臨挑戰，特別是北京採取「戰狼外交」、掩蓋新冠病毒疫情情資、強推香港國家安全法、在新疆實施強迫勞動、以及侵擾臺灣空域等所產生的衝突（Baker and Emmott 2020; European Council 2021）。在三大經濟體強權競爭下，東協戰略地位提升。考量歐盟與美中關係轉變，歐盟追求「戰略自主」、發展符合自身利益的亞洲政策，並將和東協洽簽FTA列爲重要目標。

第二，巨型區域貿易協定如CPTPP與RCEP的成形，正是「第三波區域間

主義」最顯著的特徵。嚴格來說，這兩項協定屬於跨區域主義而非區域間主義，因為會員國是以個別國家參與，而非透過區域組織。然而，跨區域主義仍幫助區域間主義建構規範性基礎。由於這些巨型協定預期將造成貿易轉移效果，不利於協定範圍外的貿易關係，歐盟即在「印太戰略」中提到此項潛在威脅，認為有必要加強其在印太地區的貿易地位，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Council of the EU 2021a, 7）。對於東協國家來說，與歐盟簽訂協定能夠達到「避險」目的，例如減低美中貿易戰衍生的風險。根據統計，58.9%的東協重要受訪者認為歐盟與東協FTA將增加東協的戰略空間（Seah et al. 2021, 30-31），81%的歐盟受訪者亦認為歐盟與東協FTA相較於對單一國家的雙邊FTA，將帶來更多利益（EU-ASEAN Business Council 2020, 7, 30）。

第三，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更凸顯歐盟與更多東協國家或是東協整體洽談FTA的重要性（Council of the EU 2021a, 6）。至於東協，則希望透過已完成簽署的RCEP，以及未來與歐盟洽簽的FTA，來作為刺激貿易的重要工具。由於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流量金額相比2019年大幅萎縮42%，東協能否持續吸引歐洲資金投入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歐盟在2019年仍是東協的第三大FDI流量來源地（ASEAN 2020a, 124; UNCTAD 2021）。

上述的全球系統性因素，能幫助理解歐盟與東協FTA談判的背景脈絡，但要進一步分析兩區域間的經貿談判，必須剖析歐盟與東協各自的法律與政治議題，因為這些因素皆會影響雙邊的談判與批准過程。根據歐盟運作條約，歐盟執委會如認為有向特定國家或區域談判FTA的需求，會向歐盟理事會建議；歐盟理事會若同意，則再授權歐盟執委會展開貿易談判。歐盟執委會負責進行FTA談判，但談判結果及協定文本將再送交歐盟理事會審查以及歐洲議會批准。歐盟理事會與歐盟執委會一般著重於貿易協定中實質利益的範疇，歐洲議會則通常強調意識形態的價值層面，例如人權保護與永續發展等議題（McKenzie and Meissner 2017）。

不同於歐盟的超國家架構，東協的FTA談判仍是以各成員國為主，東協秘書處在FTA談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相當微小，因為東協憲章關於東協秘書處締約權限不適用於對各成員國產生義務的條約（ASEAN 2011）。至於條約的批

准與生效權力也掌握在各成員國的國家議會，而非東協國家議會大會。這些法律及組織設計上的差別，影響歐盟與東協的經貿談判進程。

在「第三波區域間主義」初期，歐洲議會曾呼籲以與新加坡或其他東協國家的雙邊談判，來設定區域間FTA的基準（European Parliament 2003）。2004年吳作棟提議歐盟與東協洽簽FTA（Goh 2004），但歐盟貿易專員拉米（Pascal Lamy）建議歐盟應著重於前述的TREATI架構，因為東協的非關稅障礙仍阻礙貿易與投資發展（Lamy 2004）。

2000年代中期全球政經局勢的轉變，改變了歐盟的立場。2006年歐盟執委會揭示「全球歐洲」（Global Europe）文件，強調兩項尋求FTA談判對象的標準，分別為市場潛力以及對歐盟出口產品的保護措施程度，該文件也因此將東協設為FTA優先談判對象（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11）。在評估區域對區域FTA可行性後，東協與歐盟視野小組（ASEAN-EU Vision Group）建議在七年內消除90%的關稅（2006, 11-12）。此外，有別於大部分東協FTA以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的模式進行，歐盟與東協FTA應採用單一且全面的協定形式。最後，基於東協會員國間發展差異性，歐盟應對發展較落後的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給予特別差異性待遇（ASEAN-EU Vision Group 2006, 1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4）。

可行性研究完成後，歐盟理事會授權歐盟執委會於2007年展開與東協的區域對區域FTA談判（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4-5）。歐洲議會也依慣例要求談判FTA的前提為PCA，因為PCA具有強制性的人權條款。但FTA談判在兩年後遇到障礙，共同委員會決定在2009年暫停談判。兩區域在一些敏感議題上意見相當分歧，例如東協擔心90%關稅減免時程過快（ASEAN-EU Vision Group 2006），以及歐盟不滿將人權紀錄不良的緬甸納入談判成員國等（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5）。在暫緩談判前，歐盟執委會曾試圖另外與汶萊、新加坡和泰國等「領先國家群」（forerunners）組合談判，但此種方式並未成功。

直到2015年歐盟發布「全面貿易」政策，才使歐盟與東協FTA的談判死灰復燃。歐盟執委會宣布將採取「堆積木」方式，先與新加坡與越南等個別東協國家洽簽雙邊FTA協定，作為將來與其他東協國家談判的基準。歐盟也已與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與緬甸展開FTA談判，不過與緬甸的談判已在2017年暫停（European Commission 2021e, 3）。無論如何，此類作法呼應前述歐洲議會的建議，也就是從「開路者」協定開始，建立未來區域對區域FTA的基礎。歐新FTA談判於是在2009年展開，2014年完成；歐越FTA談判則於2012年展開，2017年完成，兩者為歐盟與東協FTA談判注入活力。對東協來說，與歐盟簽訂FTA有利於追求「東協經濟共同體2025藍圖」揭示的「全球東協」目標（ASEAN 2017b, 46-47），因此雙方於2017年後重啓區域對區域FTA談判的對話。歐盟與東協FTA和全面航空運輸協定（Comprehensiv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將作為兩區域間的指標性協定。

參、開路者協定：歐新FTA與歐越FTA

如前所述，歐盟在「印太戰略」中誓言將在過去與日本、南韓、新加坡和越南簽署的FTA基礎上，與印太夥伴簽訂更多經濟協定，以推進歐盟的經貿議程以及保護歐盟的供應鏈（Council of the EU 2021a, 7）。歐盟透過增加在印太區域的FTA網絡密集度，獲取新現實主義強調的「相對利益」，進而擴張其影響力，並往「全球領導」的目標邁進。而以東協國家角度出發，和歐盟建立FTA連結，也能將雞蛋放在不同籃子而達到「避險」的目標，同時強化他們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此外，東協亦能藉此彰顯其對於經濟整合與貿易自由化的決心。因此，東協各國外交部長在2020年12月與歐盟舉行的第23屆部長級會議上，除承諾為歐盟與東協FTA建構務實的談判架構，並讚揚歐新與歐越達成簽署FTA的目標，以及鼓勵歐盟與印尼能在FTA談判上取得進展（Council of the EU 2020）。

鑒於歐盟在東南亞的兩項「開路者」協定對歐盟推動「印太戰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接續兩節將研析歐新與歐越FTA的法律架構，並藉此充實歐盟與東協「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的概念。比較兩者幾項重要的機制設計，亦能釐清歐盟如何透過經濟協定推廣建構主義重視的規範與價值，但同時仍針對談判對象彈性調整FTA的內容。

基於歐盟法院2/15意見書的裁決，2017年歐盟與新加坡將原來談妥的FTA

文本分為FTA與IPA兩協定，並於2018年完成簽署。歐盟與越南的FTA談判也採取相同分流模式，在2019年簽署新的FTA與IPA。根據新加坡法律，對外貿易協定不需經過國會同意批准，因此歐新FTA與IPA在2019年經由歐洲議會批准後，FTA直接生效（Lim, Mohan, and Lim 2020）。2020年，歐越FTA在歐洲議會與越南國會通過後生效（Dezan Shira & Associates 2020）。至於歐盟與兩國簽署的IPA，仍需要等待27個歐盟會員國各別批准才會生效。

歐盟與新越兩國簽署的FTA使歐盟與東協最新的區域間主義發展輪廓更加清晰，因為他們代表歐盟「新世代FTA」，以及首兩項與東協國家簽署的FTA。歐新FTA是歐盟繼與南韓及日本簽署FTA後，第三項與亞洲國家簽署的FTA；歐越FTA則是現有歐盟與開發中國家簽署的協定中，涵蓋範圍最全面的貿易協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20c）。以下將依序就關稅減免與東協特殊原產地規則、服務貿易，以及電子商務與數位貿易，比較兩項「開路者」協定的機制設計。

一、關稅減讓與東協特殊原產地規則

關稅減免是貿易談判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由於新加坡與越南的發展程度不同，歐新與歐越FTA中所設定的關稅自由化目標亦具有差異性。雖然99%新加坡進口的產品已享有零關稅待遇，但歐新FTA仍對歐洲企業有利，因為新加坡在WTO的承諾僅涵蓋69.3%的稅則項目（WTO 2016, 27-28）。歐越FTA強調越南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因此對於其他東協的開發中國家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歐越FTA的終極目標為削除99%的關稅，但因為越南處於開發中國家的階段，關稅減讓的內容對越南較為有利（European Commission 2020d）。越南從歐盟進口的65%產品關稅在FTA生效後免除，但剩餘的項目將有十年的緩衝期來逐漸削除，反觀歐盟對越南進口產品的關稅承諾將在七年內消除（EuroCham in Vietnam 2019, 6;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d）。作為開發中國家，越南已獲有歐盟GSP的待遇，對歐盟75%的出口產品享有較低關稅，而歐越FTA除了保障GSP，更超過GSP的優惠（SICC 2020a, 11）。這對於其他七個目前享有GSP待遇的東協國家來說，可作為未來與歐盟簽署雙邊或區域FTA時

談判關稅減讓的參考。⁹

相比於歐新FTA，歐越FTA具有一些特別針對開發中國家的條文。與CPTPP類似，歐越FTA也納入再製造產品（remanufactured goods）的規則。這些產品雖採用二手零件，但產品的效能、狀態、使用效期與保證條件都跟全新產品差異不大。CPTPP規定這些再製造產品與全新產品受到相同的規範，歐越FTA也同樣採用此標準，但可要求標示清楚為再製造產品以避免混淆欺騙消費者。

除了關稅減讓，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也為FTA重要的機制，因其能確保僅FTA簽署國的產品才能享有優惠關稅待遇。對於東協來說，歐新與歐越FTA採用的「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ASEAN cumulation），以及允許亞洲食物產品免關稅出口至歐盟，能幫助達到「東協經濟共同體2025藍圖」設定的市場整合目標。

歐新與歐越FTA給予出口商選擇使用「關稅分類規則」（tariff classification rule）或是「區域產值含量」（regional value content，以下簡稱：RVC）的彈性，出口商透過兩者皆能享有FTA關稅優惠待遇（SICC 2020a; 2020b）。在大多數東協簽署的FTA中，RVC門檻為40%，未達到此門檻的產品被視為非來自東協原產地，不能享有FTA優惠（Nguyen, Elms, and Lavanya 2019, 29）。至於歐盟與新越兩國簽署的FTA，認定「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可作為RVC的基準，也對區域供應鏈帶來實際益處。舉例而言，新加坡不是區域製造中心，倘若RVC規則限制僅「新加坡製造」產品適用，將抵銷FTA的效益。

「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並不是新的概念，歐盟的GSP已有針對東協國家「區域累積」（regional cumulation）的條款（European Parliament 2018b）。類似的規定也出現在「東協加一」（ASEAN Plus One）的FTA。以東協與中國FTA和東協與日本EPA為例，只要是來自東協十國的生產原料皆可納入RVC計算。歐新與歐越FTA都將「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納入，惟兩者有以下四個主要差異處。

首先，根據兩項FTA各自的一號議定書（Protocol 1），任一東協國家只要

⁹ 東協十國除新加坡與汶萊外，皆享有歐盟GSP待遇。

有和歐盟簽訂FTA，其生產的加工產品可以享有累積條款的待遇。由於東協各國都想爭取成為區域出口中心，此項設計預計會造成「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Baldwin 1993, 2-5），促使更多東協國家加速與歐盟談判FTA的意願。不過目前歐越FTA的「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僅限於墨魚、魷魚與章魚。預料未來歐盟與其他東協國家簽署更多協定時，原產地規則將被檢討與修正，以確保各FTA間的一致性。

第二，歐新FTA的規定下，不是所有產品原料來源國都必需為與歐盟具有FTA關係的國家才能適用「東協原產地規則累積條款」。對於某些指定的產品，新加坡的製造商被允許自由運用其他東協國家的原物料與零件，並算作原產地原料。這些特定產品列在「附件D」（Annex D）中，但該類產品大約只占新加坡從其他東協國家總進口值的18.8%，因此效益不顯著。未來Annex D如果擴大範圍，將刺激東協企業重整供應鏈以利用歐新FTA。

第三，以紡織業為例，相較於CPTPP「從紗開始」（yarn forward）原產地規則明定使用成員國的紡紗與布料才能享有優惠關稅，歐越FTA則是「從布開始」（fabric forward），因為該協定延伸累積條款範圍至南韓的布料；至於歐新FTA則沒有此項規則。實務上，CPTPP對越南成衣與紡織業有相當挑戰，主要因素是越南重度依賴源自如中國、南韓與臺灣等非CPTPP會員國的紡紗與布料（Kikuchi, Yanagida, and Vo 2018, 6-9）。在歐越FTA的規範下，越南可以進口南韓的布料並出口成品至歐盟，因此減少對於中國布料的依賴。這類累積條款的延伸也會吸引更多南韓服飾製造公司進一步投資越南，在越南設廠。

第四，亞洲以多元飲食文化為名，而歐新FTA亦針對食品貿易制定原產地規則，使其成為第一項讓亞洲食品享有零關稅待遇的貿易協定；歐越FTA則無此類規定。歐新FTA的一號議定書「附件B」（Annex B）中，列出春捲與米粉等亞洲食品。雖然Annex B針對非原產材料（non-originating materials）有所限制，不過Annex B (a)有例外規定，允許食品適用更彈性的原產地規則，每年配額上限為1,250公噸。

二、服務貿易

歐新與歐越FTA皆涵蓋服務貿易。服務業產值分別占新加坡GDP的70%與

越南的40%（O'Neill 2021; Delegation of the EU to Vietnam 2019, 51），強化服務貿易能鞏固新加坡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幫助越南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對於歐盟來說，由於WTO談判停滯，加上目前並無東協國家參與WTO架構下的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談判，FTA因此為歐盟唯一可增加在東協服務貿易利益的管道。

不同於CPTPP採用負面表列服務貿易的承諾，歐新FTA與歐越FTA涉及服務貿易的部分與GATS相同，採取較保守的正面表列方式。兩項FTA最大的不同處，在於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條款。與歐加CETA及歐韓FTA類似，歐越FTA包含最惠國待遇條款，但適用範圍排除資通訊與文化等服務產業。歐新FTA的服務貿易則不包含最惠國待遇條款，也就是說，歐盟與新加坡沒有義務將最惠國待遇延伸至未來與第三方簽署的FTA（European Parliament 2018a, 13-14）。然需注意歐新FTA在新加坡對銀行業的承諾上，仍存在有限度的最惠國待遇。

兩項FTA均增加更多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的機會，範圍包含電腦、環境與航空等服務業。舉例來說，新加坡給予郵政與快遞服務超過WTO承諾的市場准入待遇，快捷信件的商業據點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也就是GATS定義的服務貿易模式三（mode 3）限制將被移除。至於歐越FTA則將在協定生效五年後免除WTO內含的經濟需求測試（Economic Needs Test）制度，讓歐盟的分銷業者受惠（EuroCham in Vietnam 2019, 36）。此外，越南針對銀行服務與航海運輸業，也將合資企業的外資股權上限分別從30%與49%，放寬至49%與70%（Delegation of the EU to Vietnam 2019, 52）。

兩項FTA亦有利於專業人士移動，也就是GATS定義服務貿易模式四（mode 4）的自然人移動（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現代的貿易協定通常會促進企業組織內的人員移動，越南在與歐盟簽訂的FTA中，承諾延長歐盟經理、執行長與專家待在越南的期限（World Bank 2020, 45）。歐新FTA甚至允許歐盟企業培訓的研究生（graduate trainees）在新加坡培訓一年，以獲取實務經驗、幫助職涯發展；歐越FTA也有類似針對培訓僱員（trainee employees）的條款。

雖然歐新與歐越FTA對於歐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具有正面影響，

但相較於其他FTA仍有稍嫌不足的地方。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規定，外資銀行可申請成為「特許全執照銀行」（Qualifying Full Bank）或「批發銀行」（wholesale bank），前者可經營新加坡銀行法核准之所有銀行業務，但營業據點有最多25處的上限；後者則可經營大部分銀行業務，但不可經營新元業務。而美新FTA給予美資銀行更優惠的待遇，例如美資「特許全執照銀行」可先設立30個營業據點，之後並無上限，並且可加入新加坡本土銀行的自動提款機網絡。雖然歐新與美新FTA簽署期相隔15年之久，但並未給予歐資銀行更佳的優惠待遇。即使歐資銀行同樣享有參與ATM網絡的優惠待遇，不過仍有50處的營業據點上限，不如對美資銀行營業據點數量無上限的待遇。此外，美新FTA在服務貿易章節裡包括一般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但歐新FTA如前所述，僅有適用於銀行服務的有限最惠國待遇條款。

三、數位貿易與電子商務

數位貿易與電子商務屬於數位化（digitalization）的範疇，也是「歐盟印太戰略」強調的重點合作項目之一。歐盟在數位治理上提出更高的標準，以求在支持開放貿易以及跨境資料傳輸的同時，能保護個人隱私並強化資安機制（Council of the EU 2021a, 10;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10-12）。數位治理在疫情時代更加重要，因為封城與維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使得數位服務需求大幅上升，特別是在教育、金融與遠端醫療看診等領域（WTO 2020）。

現代FTA大多納入電子商務的條文，有利於加速「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與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歐新與歐越FTA亦不例外，兩者均觸及電子商務的規定，但與服務貿易開放程度不足的問題相似，歐盟企業可能也會對這兩項FTA的數位貿易章節內容感到失望。歐新FTA有關電子商務的規定僅有五條，歐越FTA也僅有三條，而且這些規則沒有達到作為「開路者」協定的理想標準。主要原因之一為談判時間稍早，因為歐盟與新越兩國完成服務貿易與電子商務的條文談判年份分別為2012年與2015年，無法如CPTPP一般將更現代化的規定導入。

兩項FTA皆允許服務提供廠商以電子方式跨境傳輸資料，並禁止對跨境傳

輸課徵關稅。此外，兩者亦提供各方主管機關談判電子商務行政規範的平台，例如磋商電子簽名的認定規則。不過與CPTPP相較，歐新FTA在電子簽名的管理相對保守，雙方仍須進一步理解各自在電子簽名的相關立法，來評估相互承認電子簽名的可行性。CPTPP在這方面就有明確的規定，締約國不能否決電子簽名的有效性。為了推進「歐盟印太戰略」，以及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0年宣示的「歐洲數位十年計畫」（Europe's Digital Decade），歐盟未來與東協FTA的談判需要考慮有關亞洲國家的電子商務條文（European Commission 2020e, 12）。

至於越南在履行對電子商務的承諾上則具有高度爭議性，主要的癥結點為「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規定。CPTPP與東協電子商務協定（ASEAN Agreement on e-Commerce）禁止會員國要求資料儲存器材（例如同伺服器）必須設置於國內才可進行商業行為（Wong 2020），而CPTPP於2019年1月在越南生效，迫使該社會主義國家遵循西方標準。不過，越南國會2018年6月新通過的資安法（Law on Cybersecurity）亦在次年1月生效，要求「資料在地化」，以及外國企業在政府有需要時必需配合提供資訊（Eurocham in Vietnam 2019, 45）。

嚴格來說，越南通過資安法並未「違反」CPTPP的規定，因為其爭端解決條文，以及越南與加拿大、日本及紐西蘭的協定附屬文件（side letters）均提供寬限期（Burke and Nguyen 2018）。此外，CPTPP對於個資保護的條文，在越南建立相關法律架構前不適用於該國。不過，本文認為通過資安法已違背CPTPP的核心理念，造成寬限期與例外原則的濫用，因為這些例外規則是建立在「合理性公共政策」的前提上。此外，越南以維護國家主權與社會安定為由，容易將資安範圍無限上綱，違反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GDPR）的原則（EuroCham in Vietnam 2019, 45-46），以及前述「歐盟印太戰略」關於促進資安與數位化的宗旨。因此，針對未來歐盟與東協FTA的電子商務條文，歐盟談判者應綜合參考CPTPP與歐盟GDPR的法律條文與實務經驗，限制寬限期以避免國家規避相關條約內容。

肆、「新世代FTA」元素

歐盟在與新越兩國簽署的FTA以及「印太戰略」中重視永續發展，凸顯過去十多年來歐盟推動簽署「新世代FTA」的精神，並彰顯歐盟與東協「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的特徵。2006年前，歐盟第一世代FTA聚焦於貨品貿易，而「新世代FTA」是在「全球歐洲」政策發表後展開，將FTA範疇延伸至服務貿易、投資保障、人權與永續發展、智慧財產與政府採購，內含建構主義強調的歐洲規範與價值（洪德欽 2012）。里斯本條約在2009年生效，修正並強化了歐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與歐盟運作條約（蘇宏達 2010;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b）。

歐新與歐越IPA，為FTA的法律結構帶來重大的突破。如前所述，因應歐盟法院2/15意見書，原歐新與歐越FTA的談判文本分為FTA與IPA，此分流模式也影響正在進行中的歐日IPA談判。這些具有新世代元素的FTA、IPA與PCA等協定，共同形塑後疫情時代的「第三波區域間主義」。

一、人權與永續發展：歐洲價值核心

為了將里斯本條約揭示的價值普世化，歐盟對外推動的FTA重視人權與永續發展（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22-23），而正如「歐盟印太戰略」所揭示，推動人權、勞工權以及永續發展，為歐盟在2020年代的重要目標（Council of the EU 2021a, 2, 7;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歐盟與東協在推廣「價值」的方式不同，東協承認人權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但聚焦於所謂建設性的互動接觸，而非透過FTA來推廣非直接與貿易相關的議題。歐盟則是在歐洲議會堅持歐洲價值的原則下，將核心價值與貿易談判緊密結合，藉以推廣其規範與價值。

歐盟對於違反人權國家的有利手段之一，就是取消GSP所提供的優惠關稅待遇來「處罰」GSP受惠國家（European Parliament 2018b, 13）。2020年，歐盟執委會針對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解散反對黨、指控反對黨領袖叛國的行為，部分暫停柬埔寨「除武器外一切都行」（Everything But Arms）的GSP待遇，估計影響該國對歐盟出口額的20%（European Commission

2020f)。除了柬埔寨，近年菲律賓與緬甸人權發展嚴重倒退，也可能導致其享有的GSP被歐盟取消，並影響歐盟與東協FTA的談判（European Parliament 2018b, 32; Gilson 2020, 740）。尤其緬甸在2021年2月發生軍事政變後，歐盟已針對軍政府官員實施資產凍結與旅遊禁令等制裁，並禁止歐盟企業與軍方控制的企業進行生意往來（Council of the EU 2021b）。

爲了確保貿易與人權的連結，歐盟規定在簽署FTA之前必須先談好PCA，而PCA包含強制性的人權條款（European Parliament 2008）。因此，歐越PCA在2012年簽署，比雙方於1995年簽署的合作協定（Cooperation Agreement）範圍更廣（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3）；歐新PCA則在2018年簽署（UK Parliament 2019）。兩項PCA都強調該協定爲雙邊制度性架構的一部份。根據PCA的規定，尊重國際人權是至關重要的元素，且任何一方有權對違反人權義務的一方採取「適當的措施」（appropriate measures）。

雖然兩項PCA要求各方採取措施前須經過協商，歐新PCA的「不履行」（non-execution）機制允許在「特殊系統性的、嚴重的與重大的」違反事件下暫停執行PCA與FTA。歐加戰略夥伴協定（EU-Canad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提出更強化的條件條款，可直接終止歐加CETA，而非只是暫停執行（European Parliament 2019a, 9-10）。比較歐盟對東南亞兩國與加拿大的不同作法，可看出人權發展階段的差異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FTA的效度（validity）。

歐新談判FTA的過程中，雙邊對於人權看法有歧異，但歐洲議會似乎更重視商業利益。至於PCA可能造成FTA暫停的機制，歐新雙邊透過附屬文件達成妥協（McKenzie and Meissner 2017, 841-843）。根據此附屬文件，歐盟間接承認新加坡現行法律及實務應用不違反歐新PCA人權規範。歐盟的立場似乎與以往批判新加坡以刑法（Penal Code）宣判死刑，以及依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宣判拘留的態度相互矛盾（European Parliament 1991; Heads of Mission of the EU et al. 2020）。新加坡政府在過去幾年並未修訂相關法條，且判決的死刑與拘留人數也未顯著減少（Today 2019）。歐洲議會亦對新加坡法律規定男同性戀間發生性行爲觸犯刑法表示不滿，要求新加坡改善同性戀權益（European Parliament 2019b），不過這些爭議並未成爲雙邊簽署PCA與FTA的

阻礙。

歐盟對於越南則採取強硬的態度（Hoang and Sicurelli 2017, 373）。2014年，歐洲議會特別要求歐盟執委會研究歐越FTA對人權的影響（European Parliament 2014），但遭到歐盟執委會拒絕，理由是2009年已針對歐盟與東協FTA進行永續性影響評估（European Parliament 2016, 8）。該理由與歐洲議會2010年的決議不符，因當時要求歐盟執委會針對FTA對人權與永續發展的影響進行專案研究（European Parliament 2010）。歐洲監察使（European Ombudsman）後來認定歐盟執委會沒有專案評估人權，屬於失職（maladministration）（European Ombudsman 2016）。雖然監察使的決定不具法律拘束力，但歐洲議會嚴厲批判歐盟執委會並未遵循法規，並重申對於越南政治與宗教迫害、資安法與死刑的重大疑慮（European Parliament 2016）。對於監察使與歐洲議會的意見，歐盟執委會僅表示會在歐越FTA生效後，搜集足夠證據與資料，以事後評估的方式檢視人權議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22）。雖然不滿意歐盟執委會的立場，歐洲議會仍在2020年批准歐越FTA，歐盟具有彈性的作法或將開啓更多貿易談判的大門。

如同人權，永續發展亦為「新世代FTA」的重要元素，以及歐盟希望能普世化的核心價值之一。遵循永續發展條文規定，亦幫助實踐歐盟與東協對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承諾。歐盟法院2/15意見書指出，永續發展的目標是「共同商業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屬於歐盟的「專屬權限」。FTA與PCA奠定了推動永續發展的法律架構，特別是在環境與勞工領域（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22-23）。與PCA相比，歐新與歐越FTA具有更多關於執行機制的特別規則，例如在關於貿易與永續發展的章節中，要求遵守國內法與國際法，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公約（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onventions）與多邊環境協定。值得注意的是，FTA的一般爭端解決機制不適用於貿易與永續發展章節所生爭議。相關爭議將由這些章節所設立的機制解決，包括透過政府諮商或是專家小組撰寫爭端解決報告等方式進行。

二、強化地理標示保障

歐盟「新世代FTA」一項重要的目的，即是納入比WTO與貿易有關之

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簡稱：TRIPS）更高標準的條款。歐新與歐越FTA皆包含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章節，且觸及重要的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相關保障。

雖然所有東協國家都是WTO會員，但是TRIPS對地理標示保護程度相對有限。歐盟執委會希望透過「新世代FTA」來加強地理標示保護的範疇以及執行程序，主要動機為保護歐洲飲食產業龐大的商業利益。對於東協國家來說，歐新與歐越FTA也能提供規範性基礎，有利使各成員國的地理標示法規趨於一致。雖然東協註冊超過340項地理標示，但地理標示的管制在各國有所不同，例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泰國的法律包含特別針對地理標示的法條，但汶萊與越南則是在商標法或一般的智慧財產權法下規範地理標示（EUIPO 2019, 13-33, 38）。

根據歐韓FTA、歐日EPA以及歐中地理標示協定，對地理標示產品的保護建立在互惠原則。歐新FTA為特殊案例，因為關於地理標示措施僅利於歐盟產品。雖然新加坡承認196項歐盟地理標示產品，但新加坡沒有對歐盟認列任何地理標示產品。主要原因是新加坡的農產品出口到歐洲的種類與數量非常有限，加上新加坡政府希望能加速FTA的談判進程，因此未在此議題爭取互惠（Leong 2017, 247-248）。此作法也凸顯新加坡的「避險」策略，希望盡快與歐盟達成協定，降低整體對外貿易的風險。至於歐越FTA保護169項歐盟地理標示產品與39項越南地理標示產品，當中對於越南邦美蜀（Buon Ma Thuot）咖啡的地理標示認證特別重要，因為歐盟是越南咖啡出口的最大市場（SICC 2020a）。歐越FTA中的地理標示條文相較於歐新FTA包含更多優惠措施，再次顯示出歐盟考量這兩個東協國家處於不同開發階段的現狀。

三、國有企業與政府採購

有別於地理標示規定給予越南較多彈性，歐越FTA對於國有企業與政府採購的規定相較於歐新FTA更為嚴格。大部分東協國家依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模式，高度依賴國有企業發展如公共基礎設施與製造業等戰略產業（Kasahara 2013, 3-6）。此發展策略在越南相當明顯，不過

國有企業一般缺乏問責制度與效率，必須引進鼓勵競爭與公開透明的規範，而FTA也順勢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管道。

歐新與歐越FTA最大的不同處之一，在於後者有專屬針對國有企業的章節。歐新FTA僅有兩項在競爭章節的相關條文，規範公共事業與享有特殊或特許權利的事業，以及國家專賣（state monopoly）。雖然歐新FTA未明確定義何謂國有企業，但CPTPP定義國有企業為政府擁有50%的股權與投票權，或者擁有指定多數董事會成員的權力。美新FTA採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認定，只要是政府可以有效影響決策的企業都算為國有企業（McLaughlin 2019, 617）。與CPTPP和美新FTA對於國有企業的定義類似，歐越FTA採取50%股權的基準，並評估政府是否對企業決策具有主導權。不過歐越FTA排除那些規模與商業利益較小的國有企業，給予五年的寬限期。雖然歐新FTA與歐越FTA皆包含非歧視性與商業考量等原則，歐越FTA則有特定條文規範國有企業相關的企業治理與透明度。

有關政府採購部分，歐盟與新加坡皆為WTO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的成員，但越南與其他東協國家尚未加入這項協定。歐新與歐越FTA中關於政府採購的章節，包含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歐新FTA進一步降低政府採購協定的貨品與服務價值門檻，並增加政府單位的範圍（European Parliament 2018a, 26-27）。此外，歐新FTA涵蓋更多種形式的契約，例如促進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的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

四、爭端解決機制中的「投資法庭制度」

除了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機制，歐盟針對投資人與地主國相關爭議案件在IPA中納入「投資法庭制度」（Investment Court System），引起學界與實務界的關注。在2010年跨國菸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以菸品素面包裝措施損害投資利益為由，向國際爭端解決中心與常設仲裁法院控訴澳洲政府後（Philip Morris v. Australia），傳統的ISDS機制遭到批判。許多國家認為舊有的機制有幾項主要缺陷，例如缺乏獨立仲裁法官、易造成地主國過高法律成本，以及政府可能面對曠日費時的訴訟與巨額賠款，因此產生「管制寒蟬效應」

(regulatory chill) (Langford et al. 2020)。對此，聯合國從2017年開始設立工作小組討論ISDS改革，較新的投資保障協定也採用不同種方式，排除、限制或是改善ISDS (UNCITRAL 2021; UNCTAD 2020, 115-116)。

歐盟計劃以「投資法庭制度」來完全取代舊有的ISDS機制，「投資法庭制度」包含兩個階層的特別法庭，與WTO爭端解決機制小組 (panel) 與上訴機構 (Appellate Body) 設計類似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投資法庭制度」算是歐盟規範性權力的指標性計畫，有助於未來推動針對ISDS案件所設置的多邊投資法庭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¹⁰

歐盟2014年展開針對「投資法庭制度」的公聽過程，徵詢各方意見。同年，原歐新FTA文本的投資章節亦完成談判，其內容也顯示將採取類似WTO上訴機構的設計。後續在2015年歐盟執委會的「全面貿易」政策，以及正在談判的歐盟與美國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 (EU-US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以下簡稱：TTIP) 中，則清楚地論述設置「投資法庭制度」的目標與細節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 21)。雖然川普政府暫停TTIP談判，但「投資法庭制度」被納入歐加CETA與歐越FTA，不過前者因未將投資章節獨立分出，其涉及包含「投資法庭制度」在內的投資保障條文基於前述「共享權限」的爭議尚未生效 (Kleimann and Kübek 2018, 30-31)。

歐盟法院2/15意見書釐清「共同商業政策」之範疇，並導致後來將IPA獨立於FTA之外。歐盟依據歐盟運作條約對於「共同商業政策」擁有「專屬權限」，但根據該條約第207條，「共同商業政策」的範圍具有爭議性。根據歐盟法院，ISDS機制會不當排除會員國法院對該類爭議之管轄權，因此ISDS機制的核准權屬於歐盟與會員國的「共享權限」 (Cremona 2018, 255-256)。歐盟與新越兩國簽署的IPA內容，反映出近年協定的趨勢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a, 18-20)。兩者IPA包含國民待遇、公正與公平待遇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原則，以及間接徵收相關規範。截至2020年，歐盟已與加拿大、新

¹⁰ 值得一提的是，歐盟與新加坡和越南簽署的IPA通過後，將直接取代現有新加坡與歐盟12國、越南與歐盟15國的雙邊投資協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以下簡稱：BIT)，有利於法遵。

加坡、越南及墨西哥等四國簽署納入「投資法庭制度」的協定。一些專家學者可能認為「投資法庭制度」將讓歐盟形塑歐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與亞洲區域主義，藉此強化歐盟規範性權力，但本文持保留態度。以CPTPP為例，雖然其考慮採用WTO上訴機構機制，但已暫緩幾項原TPP關於ISDS機制的條文。除此之外，近來東協與香港的投資保障協定（ASEAN-Hong Kong Investment Agreement）、英日全面經濟夥伴協定（UK-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與RCEP皆未納入ISDS機制條款（Beth and Nottage 2020, 8-11），因此新常態似乎是要限制與排除ISDS機制。

現有關於ISDS機制的文獻多半強調歐盟的法規要求，卻很少深入地研究亞洲國家的立場。歐盟聲稱「投資法庭制度」取代ISDS為改革，但亞洲國家把歐盟的提議視為「超ISDS」的設計，不認為「投資法庭制度」會在既有東協全面投資協定（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以及各項「東協加一」FTA協定之外帶來更多好處。2014年，印尼決定透過單方面終止與荷蘭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簡稱：BIT），來表達反對ISDS機制的立場（Price 2016）。此外，對於經濟較低度發展的國家如緬甸，兩階段法庭衍生的相關審判與人事費用，可能為國家財政帶來龐大負擔，因此這些國家多半對於ISDS機制卻步。

伍、結論

本文透過探討歐盟在東協區域已簽署的歐新與歐越FTA，試圖理解「歐盟印太戰略」中關於經貿政策的脈絡，以及歐盟與東協區域間主義的最新發展。過去40多年來，歐盟與東協歷經三波區域間主義的互動過程，歐盟對東協的態度也從早期以優越的超國家區域組織自居看待東協，到2010年代轉變成稱呼東協為重要的「自然夥伴」。2020年，歐盟進一步將兩區域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並於次年將東協列為「印太戰略」的重要角色。本文認為歐盟希望透過與東協國家洽簽經濟協定，以增強其「印太戰略」的效力，而隨著雙邊關係逐漸增溫，東協在全球的經貿戰略地位提升，雙邊互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法律架構亦充實「新區域間主義」的概念。

如「歐盟印太戰略」所示，歐盟不想缺席印太舞台，並強調與東協合作的重要性。歐盟過去與東協發展的各项經貿合作機制，特別是近年與新越兩國達成的FTA，均是「已堆好的積木」，有利於歐盟進一步推動「印太戰略」中以法治與永續發展為核心的各項重點計畫。雖然從建構主義角度詮釋，東協國家的規範、認同與價值與歐盟不盡相同，但歐盟仍可採用彈性的方式推廣「新世代FTA」，務實地施展規範性權力。相較於歐新FTA，此類彈性特別顯現於歐越FTA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而從東協立場觀之，強化與歐盟的經貿連結能增進東協作為區域組織的集體認同，並提升東協的談判實力與地位。其發展亦有助其在對外關係上執行「避險」戰略，進而在強權競爭的環境中獲取利益並控管風險。

作為「開路者」協定，歐新與歐越FTA除在實務上將作為歐盟與東協其他國家以及東協本身的FTA談判參考，亦有助於「第三波區域間主義」的理論發展。因此，深入分析歐盟與東協洽簽經濟協定的策略與內容，將有助於理解歐盟新推出的「印太戰略」思維，以及歐盟與東協的「第三波區域間主義」最新進展。

（收件：110年8月16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The E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Case of EU-ASEAN Pathfinder Agreements

Bo-Jiun Ji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Pasha L. Hsieh

Associate Professor, Jean Monnet Chair
School of Law,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Abstract

Indo-Pacific strategies have become sali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 April 2021, the European Union (EU) for the first time declared its ow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fact, global systemic factors such as the shift of economic power to Asia and the intense geopolitical rivalry in the region have galvani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Third Interregionalism between the EU and ASEAN. Other than economic agreements, both blocs upgraded their Dialogue Partnership to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2020.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U's economic agreements with ASEAN countries not only implement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but also enhance the global status of ASEAN, hence buttr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egionalism theories. By focusing on the EU's pathfin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with Singapore and Vietnam,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EU's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EAN und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areas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key

components of new generation trade pacts such as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As a result, give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Singapore and Vietnam, the EU's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th Vietnam includes additional flexibilities. The nexus between these agreements and the EU's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vide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EU's normative efforts to promote European values in Asia in the context of EU-ASEAN interregionalism.

Keywords: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Union (EU),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do-Pacific Strategy,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參考文獻

- 王啓明，2010，〈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與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以歐盟、北美與東亞區域「三元體」互動之探討〉，《國際關係學報》，30：105-135。Wang, Chi-Ming. 2010. “Qu yu jian zhu yi (Inter-regionalism) yu guo ji she hui hua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yi ou meng, bei mei yu dong ya qu yu ‘san yuan ti’ hu dong zhi tan tao”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 The Analysis of Triad Interaction among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0: 105-135.
- 吳東野，2005，〈從亞歐會議論區域間主義的發展〉，《問題與研究》，44 (3)：1-31。Wu, Tung-Yeh. 2005. “Cong ya ou hui yi lun qu yu jian zhu yi de fa zhan” [Inter-Regionalism Development Viewing from “Asia-Europe Meeting”]. *Wenti Yu Yanjiu*, 44 (3): 1-31.
- 吳建輝，2012，〈歐盟對外經貿法之發展：法律與政策變遷〉，《歐美研究》，42 (4)：753-839。Wu, Chien-Huei. 2012. “Ou meng dui wai jing mao fa zhi fa zhan: fa lu yu zheng ce bian qian” [The Evolution of EU External Economic Law—Legal and Policy Changes]. *EurAmerica*, 42 (4): 753-839.
- 李貴英，2007，〈論歐洲憲法條約架構下之共同商業政策〉，《政大法學評論》，96: 345-396。Li, Catherine. 2007. “Lun ou zhou xian fa tiao yue jia gou xia zhi gong tong shang ye zheng ce” [Legal Analysis on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i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 of the Europe]. *Chengchi Law Review*, 96: 345-396.
- 洪德欽，2012，〈歐盟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政策之研究〉，《歐美研究》，42 (4)：673-752。Horng, Der-Chin. 2012. “Ou meng xin yi dai zi you mao yi xie ding zheng ce zhi yan jiu” [The EU's Policy on the New Generation Free Trade Agreements]. *EurAmerica*, 42 (4): 673-752.
- 陳麗娟，2017，〈從經貿觀點論歐盟與ASEAN區域合作模式對於「新南向政

- 策」之啓示〉，《展望與探索》，15 (7)：47-70。Chen, Li-Jiuan. 2017. “Cong jing mao guan dian lun ou meng yu ASEAN qu yu he zuo mo shi dui yu ‘xin nan xiang zheng ce’ zhi qi shi” [Inspiration from the EU-ASE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to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from an Economic and Trade Perspectiv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5 (7): 47-70.
- 張愷致、謝笠天，2020，〈新區域主義下的東南亞國協經貿整合：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問題與研究》，59 (2)：1-41。Chang, Kai-Chih and Pasha L. Hsieh. 2020. “Xin qu yu zhu yi xia de dong nan ya guo xie jing mao zheng he: yi fu wu mao yi zi you hua wei he xi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ew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Trade in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Wenti Yu Yanjiu*, 59 (2): 1-41.
- 郝培芝，2004，〈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43 (1)：125-144。Hao, Pei-Chih. 2004. “Ya ou hui yi xing cheng de jie gou xing dong li yu yi yi: cong xin qu yu zhu yi de guan dian fen xi” [Structural Motivations fo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ation of ASEM: A New Regionalism Perspective]. *Wenti Yu Yanjiu*, 43 (1): 125-144.
- 蘇宏達，2010，〈從自由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過程〉，《問題與研究》，49 (2)：1-38。Su, Hung-Dah. 2010. “Cong zi you zheng fu jian zhu yi jie xi li si ben tiao yue de fa zhan guo cheng” [Negotiating the Treaty of Lisbon: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nalysis]. *Wenti Yu Yanjiu*, 49 (2): 1-38.
- 蘇卓馨，2021，〈歐盟規範性權力與歐中投資協定談判〉，《問題與研究》，60 (4)：107-138。Su, Cho-Hsin. 2021. “Ou meng gui fan xing quan li yu ou zhong tou zi xie ding tan pan” [EU Normative Power and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Wenti Yu Yanjiu*, 60 (4): 107-138.
- Acharya, Amitav. 2004.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2): 239-275.
- Acharya, Amitav. 2009.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 Reg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charya, Amitav. 2014.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Abingdon, UK: Routledge.
- Aggarwal, Vinod K. and Edward A. Fogarty. 2004. "Betwee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European Union Interregional Trade Strategies." In Vinod K. Aggarwal and Edward A. Fogarty, eds., *EU Trade Strategies: Betwee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pp. 1-40.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AIPO (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 1983.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AIPO General Assembly on ASEAN-EC Economic Cooperation, 6GA/RES.11/83" (May 5, 2021).
- AIPO (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 1988. "Resolution of the Ninth General Assembly of AIPO on the ASEAN-EC Economic Cooperation, WC/GA9/88/KL/29/6" (May 5,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992. "1992 Agreement on The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for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https://cil.nus.edu.sg/databasecil/1992-agreement-on-the-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for-the-asean-free-trade-area/> (May 10,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1. "2011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Co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y ASEAN."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7/07/2011-Rules-of-Procedure-for-the-Conclusion-of-International-Agreements-by-ASEAN.pdf> (May 10,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2. "2013-2017 Bandar Seri Begawan Plan of Action to Strengthen the ASEAN-EU Enhanced Partnership". <https://cil.nus.edu.sg/databasecil/2013-2017-bandar-seri-begawan-plan-of-action-to-strengthen-the-asean-eu-enhanced-partnership/> (May 15,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7a. "2018-2022 ASEAN-EU Plan of Action." <https://cil.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9/02/2018-2022-ASEAN-EU-POA.pdf> (May 15,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7b.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25 Consolidated Strategic Action Plan.” <https://cil.nus.edu.sg/database/cil/2017-asean-economic-community-2025-consolidated-strategic-action-plan/> (May 15,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9.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asean.org/speechandstatement/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 (June 30,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20a.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https://www.aseanstats.org/publication/asyb_2020/ (June 15, 2021).
-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20b. “Overview of ASEAN-EU Relations (as of December 2020).” <https://asean.org/storage/Overview-of-ASEAN-EU-Relations-as-of-December-2020.pdf> (June 15, 2021).
- ASEAN-EU Vision Group. 2006. “Report of the ASEAN-EU Vision Group: Transregional Partnership for Shared and Sustainable Prosperity.” https://ditjenppi.kemendag.go.id/assets/files/publikasi/doc_20180515_asean-eu-vision-group-report.pdf (May 10, 2021).
- ASEM (Asia-Europe Meeting). 2021. “Fostering Dialogue & Cooperation Between Asia & Europe.” <https://www.aseminfoboard.org/about/overview> (June 1, 2021).
- Allurentis. 2019. “Investing in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2019-2020.” https://corporates.db.com/files/documents/Investing_in_ASEAN_2019-2020.pdf (May 20, 2021).
- Baker, Luke and Robin Emmott. 2020. “As China Pushes Back on Virus, Europe Wakes to ‘Wolf Warrior’ Diplomacy.”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europe-china-insig-idUSKBN22Q2EZ> (May 14, 2021).
- Baldwin, Richard. 1993. “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465. <https://www.nber.org/papers/w4465> (September 1993).
- Beth, Vivienne and Luke R. Nottage. 2020.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 and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 Asia.” In Julien Chaisse, Leïla Choukroune, and Sufian Jusoh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Singapore: Springer.
- Bhagwati, Jagdish. 2008. *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rrell, Josep. 2020. “Strengthening EU-ASEAN Partnership, an Urgent Necessity.”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85434/strengthening-eu-asean-partnership-urgentsnecessity_en (June 30, 2021).
- Borrell, Josep. 2021a. “The EU Needs 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the Indo-Pacific.”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94898/eu-needs-strategic-approach-indo-pacific_en (June 30, 2021).
- Borrell, Josep. 2021b. “Why I Went to Jakarta and Why the Indo-Pacific Matters for Europe.”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99613/why-i-went-jakarta-and-why-indo-pacific-matters-europe_en (June 30, 2021).
- Burke, Frederick R. and Thanh Vinh Nguyen. 2018. “Vietnam Has Ratified the CPTPP.”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db9dec6-e374-452f-a65a-873c18517799> (May 30, 2021)
- Chen, Xuechen. 2018. “The Role of ASEAN’s Identities in Reshaping the EU-ASEA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0 (2): 222-246.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9.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ASEAN.” <http://aei.pitt.edu/8240/> (June 1, 2021).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4.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A51994DC0314> (June 1, 2021).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6. “Creating a New Dynamic in EU-ASEAN Relations.” <http://aei.pitt.edu/6271/> (June 6, 2021).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 “Europe and Asia: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Enhanced Partnership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HR/TXT/?uri=CELEX:52001DC0469> (June 5, 2021).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A New Partnership with South East Asia.”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3:0399:FIN:EN:PDF> (June 5, 2021).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Report on the State of Play of the FTA Negotiations with ASEAN, India, the Andean Community and Central America” (June 10, 2021).
- Cook, Malcolm. 2021. “Europe’s Indo-Pacific Adoption: Two Southeast Asian Challenges.” *ISAS Insights*, No. 664. <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europes-indo-pacific-adoption-two-southeast-asian-challenges/> (June 16, 2021).
- Council of the EC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43/92 of 25 February 1992 on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1992R0443> (June 1, 2021).
- Council of the EU (European Union). 2007. “Nuremberg Declaration on an EU-ASEAN Enhanced Partnership.”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PRES_07_54 (June 1, 2021).
- Council of the EU (European Union). 2020. “Co-Chairs’ Press Release of the 23rd 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12/01/co-chairs-press-release-of-the-23rd-asean-eu-ministerial-meeting/> (June 6, 2021).
- Council of the EU (European Union). 2021a.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 Council Conclusions.”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914-2021-INIT/en/pdf> (May 1, 2021).
- Council of the EU (European Union). 2021b. “Myanmar/Burma: Third Round of EU Sanctions over the Military Coup and Subsequent Repress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6/21/myanmar-burma-third-round-of-eu-sanctions-over-the-military-coup-and-subsequent-repression/>

- (June 28, 2021).
- Cremona, Marise. 2018. "Shaping EU Trade Policy Post-Lisbon: Opinion 2/15 of 16 May 2017: ECJ, 16 May 2017, Opinion 2/15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14 (1): pp. 231-259.
- de La Baume, Maia. 2016. "Walloon Parliament Rejects CETA Deal."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walloon-parliament-rejects-ceta-deal/> (June 1, 2021).
- Delegation of the EU to ASEAN. 2016. "About the EU Delegation to ASEAN."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association-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905/about-eu-delegation-asean_en (June 10, 2021).
- Delegation of the EU to Vietnam. 2019. "Guide to the EU-Vietnam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june/tradoc_154622.pdf (June 16, 2021).
- Dezan Shira & Associates. 2020. "Vietnam-EU Trade: EVFTA Comes into Effect."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vietnam-eu-trade-evfta-comes-into-effect.html/> (June 3, 2021).
- Doherty, Ben. 2018. "France and Australia Can be Heart of New Indo-Pacific Axis, Macron Say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y/02/france-and-australia-can-be-heart-of-new-indo-pacific-axis-macron-says> (May 30, 2021).
- EEA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2013. "EU-ASEAN: Natural Partners." 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elegations/indonesia/documents/eu_asean/20130101_brochure_en.pdf (June 1, 2021).
- EEA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2019. "Enhanced Regional EU-ASEAN Dialogue Instrument (E-READI)."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thailand/49815/enhancedregional-eu-asean-dialogue-instrument-e-readi_km (June 10, 2021).
- Emmott, Robin. 2021. "EU Sets out Indo-Pacific Plan, Says it's not 'Anti-China.'"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eu-sets-out-indo-pacific-plan->

- says-its-not-anti-china-2021-04-19/ (May 18, 2021).
- EU-ASEAN Business Council. 2020. “2020 EU-ASEAN Sentiment Survey.” <https://www.eu-asean.eu/business-sentiment-survey> (June 15, 2021).
- EUIPO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2019.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the ASEAN Region: A Booklet on ASEA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cedure and Products.” https://internationalipcooperation.eu/sites/default/files/arise-docs/2019/ASEAN_GI-Booklet.pdf (June 18, 2021).
- EU Mission to ASEAN. 2020. “Blue Book 2020: EU-ASEAN Natural Partners.” <https://www.switch-asia.eu/resource/blue-book-2020/> (June 20, 2021).
- EuroCham in Vietnam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Vietnam). 2019. “2019 EVFTA Report -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Perspectives from Vietnam.” <https://eurochamvn.org/The-EVFTA-Report> (June 15,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Global Europe: Competing in the World”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6:0567:FIN:en:PDF> (June 15,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U and South Korea Sign Free Trade Dea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0_1292 (June 18,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The EU Accedes to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2_781 (July 12,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october/tradoc_153846.pdf (March 10,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The EU and ASEAN: A Partnership with a Strategic Purpos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JC0022> (May 18,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 “EU Finalises Proposal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Court System for TTIP.”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5_6059 (June 12,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Human Righ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U-Vietnam Relations with Specific Regard to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january/tradoc_154189.pdf (June 16,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 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8e2cad86-e3d2-11e8-b690-01aa75ed71a1/language-en>. (May 5,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a. “EU-Singapore Agreement.”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eu-singapore-agreement/> (March 1,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b.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March 1,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c.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Set to Give a Boost to EU-Asia Trad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980> (June 13,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d. “EU-Viet 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Commissioner Malmström and Minister Tran Tuan Anh.”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041> (June 30,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a. “Europe’s Moment: Repair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OM:2020:456:FIN> (June 1,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b. “The EU-UK Withdrawal Agreement.” https://ec.europa.eu/info/relations-united-kingdom/eu-uk-withdrawal-agreement_en (May 9,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c. “EU-Vietnam Trade Agreement Enters into Forc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412 (May 20,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d. “EU-Vietnam Trade Agreement - MEMO.” <https://>

- 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922 (March 17,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lenary.”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0_1655 (May 1,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f. “Cambodia Loses Duty-Free Access to the EU Market over Human Rights Concerns.”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77&title=Cambodia-loses-duty-free-access-to-the-EU-market-over-human-rights-concerns> (July 12,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104126/joint-communication-indo-pacific_en (October 30,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b. “EU-Vietnam Agreement.”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eu-vietnam-agreement/> (March 1,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c.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regions/asean/> (June 26,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d. “Top Trading Partners 2020 - Trade Statistics.”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22530.pdf (July 12, 202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e. “Overview of FTA and Other Trade Negotiations.”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december/tradoc_118238.pdf (July 12, 2021).
- European Council. 2021. “EU-US Summit Statement: ‘Towards a Renewed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6/15/eu-us-summit-statement-towards-a-renewed-transatlantic-partnership/> (June 30, 2021).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80.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 Singapore and Thailand -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78969373-6adf-44fa-b624-0884443296ac> (June 10, 2021).
- European Ombudsman. 2016. “Decision in Case 1409/2014/MHZ 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Failure to Carry Out a Prior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www.ombudsman.europa.eu/en/decision/en/64308> (June 26,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1991. “Resolu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f12ce13c-aeb2-4bb8-ac3b-36d54793f5e7> (June 26,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200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Regional Free Trade Areas And Trade Strategy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02/2044(INI)), P5TA(2003)0237.”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NONSGML+TA+P5-TA-2003-0237+0+DOC+PDF+V0//EN> (June 10,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2008.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8 May 2008 o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08IP0195> (June 1,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2010.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5 November 2010 on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0IP0434> (June 25,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2014.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7 April 2014 on the State of Play of the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4IP0458> (June 17, 2021).
-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9 June 2016 on Vietnam.”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TXT/?uri=CELEX%3A52016IP0276 (June 9,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7. “CJEU Opinion on the EU-Singapore Agree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ATA\(2017\)603955](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ATA(2017)603955) (May 29,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a.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 Analysi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fr/document.html?reference=EXPO_STU%282018%29603864 (May 30,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b. “The Generalised Scheme of Preferences Regulation (No 978/2012): European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STU\(2018\)627134](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STU(2018)627134) (June 19,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9a. “Human Rights in EU Trade Agreements: The Human Rights Clause and its Applicat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BRI\(2019\)637975](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BRI(2019)637975) (June 4,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19b. “Singapore Must Protect the Rights of LGBTI People, says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lgbti-ep.eu/2019/02/13/singapore-must-protect-the-rights-of-lgbti-people-says-european-parliament/> (May 13,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a. “MEPs Refuse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hilst Sanctions are in Plac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0517IPR04123/meps-refuse-any-agreement-with-china-whilst-sanctions-are-in-place> (July 1,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b. “Fact Sheets o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y of Lisb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en/sheet/5/the-treaty-of-lisbon> (July 1, 2021).

Fitriani, Evi. 2014. *Southeast Asians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State'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Longivit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2021. “France's Partnerships in

-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photos-publications-and-graphics/publications/article/france-s-partnerships-in-the-indo-pacific-apr-2021> (July 1, 2021).
- French Ministry of Armed Forces. 2019. “France’s Defenc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defense.gouv.fr/content/download/559608/9684004/file/France's%20Defence%20Strategy%20in%20the%20Indo-Pacific%20-%202019.pdf> (July 1, 2021).
- Frost, Ellen L. 2021.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and 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biden-administrations-trade-policy-and-u-s-relations-with-southeast-asia/> (June 15, 2021).
- Germa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2020. “Germany - Europe - Asia: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ogether”: The German Government adopts policy guideline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asien/german-government-policy-guidelines-indo-pacific/2380510> (July 1, 2021).
- Gilson, Julie. 2002.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Gilson, Julie. 2005.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7 (3): 307-326.
- Gilson, Julie. 2020. “EU-ASEAN Relations in the 2020s: Pragmatic Inter-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17: 727-745.
- Goh, Chok Tong. 2004. “Asia - Catalyst for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ia Europe Journal*, 2: 1-5.
- Goh, Evelyn.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3): 113-157.
-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2020. “Indo-Pacific: Guidelines for Strengthening Dutch and EU Cooperation with Partners in Asia.” <https://www.government.nl/>

- documents/publications/2020/11/13/indo-pacific-guidelines (July 1, 2021).
- Hänggi, Heiner. 2005.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In Search of a Typology."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pp. 48-71. Abingdon, UK: Routledge.
- Heads of Mission of the EU, EU Member States, Norway, and Switzerland. 2020. "Joint Local Statement on the Death Penalty Case of Moad Fadzir bin Mustaffa in Singapore." https://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_local_statement_preceding_execution_on_24_september_2020.docx.pdf (July 15, 2021).
- Hoang, Ha Hai and Daniela Sicurelli. 2017. "The E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Singapore and Vietnam. Market vs. Normative Imperatives." *Contemporary Politics*, 23 (4): 369-387.
- Hoang, Thi Ha, Moe Thuzar, Sanchita Basu Das, and Termsak Chalermplanupap. 2016. "Diverging Regionalisms: ASEAN and the EU." In *ASEAN and the EU in Perspective: Brexit and Beyond (ASEANFocus)*, pp. 4-13.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Hurrell, Andrew. 1995.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 37-7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sahara, Shigehisa. 2013.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UNCTAD Discussion Papers*, No. 21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dp20133_en.pdf (November 2013).
- Kikuchi, Tomoo, Kensuke Yanagida, and Huong Vo. 2018. "The Effects of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Vietnam,"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55 (C): 4-19.
- Kleimann, David and Gesa Kübek. 2018. The Signing,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the EU: The Case of CETA and Opinion 2/15,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45 (1): 13-45.

- Krauthammer, Charles. 1990.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1): 23-33.
- Kuik, Cheng-Chwee. 2016.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0): 500-514.
- Lamy, Pascal. 2004.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ASEAN-EU Partnership: The Role of Singapore." *Asia Europe Journal*, 2 (4): 485-487.
- Langford, Malcolm, Michele Potestà,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Daniel Behn. 2020. "Special Issue: UNCITRAL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form: Matching Concerns and Solutions.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1 (2-3):167-187.
- Lee, John. 2018.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Implications for ASEAN." *ISEAS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13. 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TRS13_18.pdf (June 1, 2021).
- Leering, Raoul. 2020. "Dutch Rejection of Mercosur Now Threatens Wider EU Trade Deals." <https://think.ing.com/snaps/dutch-rejection-of-mercotur-sign-of-the-times/> (June 16, 2021).
- Lenz, Tobias and Gary Marks. 2016.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p. 513-537.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ong, Susanna H.S. 2017. "European Unio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A New Chapter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Singapore." In Calboli, Irene and Wee Loon Ng-Loy, e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of Trade,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Focus on Asia-Pacific*, pp. 235-25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m, C.L., Mahdev Mohan, and Jennifer Z.J. Lim. 2020. "Ch. 05 Singapore and International Law." <https://www.singaporelawwatch.sg/About-Singapore-Law/Overview/ch-05-singapore-and-international-law> (July 10, 2021).
- Manners, Ian. 2002.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2): 235-258.
- Manners, Ian. 2006. “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 Beyond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2): 182-199.
- McKenzie, Lachlan and Katharina L. Meissner. 2017. “Human Rights Conditionality in European Union Trade Negotiations: The Case of the EU-Singapore FT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5 (4): 832-849.
- McLaughlin, Mark. 2019. “Defining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34 (3): 595-625.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for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2107.html (July 1, 2021).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2021.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UK-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www.mfa.gov.sg/Overseas-Mission/London/Announcements/Entry-into-Force-of-the-UK-Singapore-Free-Trade-Agreement> (July 1, 2021).
- Morada, Noel M. 2012.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ASEAN-EU Interregionalism between Pluralist and Solidarist Societies.”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4 (3): 89-99.
- Nishimura, Hidetoshi. 2017. “Snapshots of the ASEAN Story: ASEAN’s Strategic Policy Needs and Dialogue Partners’ Contributions.” In Surin Pitsuwan, Hidetoshi Nishimura, Ponciano Intal Jr., Kavi Chongkittavorn, and Larry Maramis, eds., *The ASEAN Journey: Reflections of ASEAN Leaders and Officials*, pp. 315-348. Jakarta, Indonesia: ERIA.
- Nguyen, Minh Hue, Deborah Elms, and N Lavanya. 2019. “The 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Evolution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In Pasha L. Hsieh and Bryan Mercurio, eds., *ASEAN Law in the New Regional Economic Order: Global Trends and Shifting Paradigms*, pp. 22-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Aaron. 2021. "Singapore: Distribu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cross Economic Sectors from 2010 to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78575/singapore-gdp-distribution-across-economic-sectors/> (July 20, 2021).
- Ordoñez, Franco. 2021. "Biden and the EU Call a Truce in a 17-Year Trade Fight to Focus on Threats from China." *NPR*. <https://www.npr.org/2021/06/15/1006445585/biden-worked-with-allies-to-speak-out-on-china-and-russia-now-the-hard-part-begi> (July 1, 2021).
- Pacheco Pardo, Ramon. 2009. "The Political Weakness of the EU in East Asia: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Asia Europe Journal*, 7 (2): 265-280.
- Price, David. 2016. "Indonesia's Bold Strategy 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eeking an Equitable Climate for Investment?"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 (1): 124-151.
- PwC (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7. "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https://www.pwc.com/gx/en/world-2050/assets/pwc-world-in-2050-summary-report-feb-2017.pdf> (June 1, 2021).
- Roloff, Ralf. 2005. "Inter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tate of the Art."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pp. 17-30. Abingdon, UK: Routledge.
- Rüländ, Jürgen. 2005. "Interregionalism: An Unfinished Agenda."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epping Stone to Global Governance?* pp. 295-313. Abingdon, UK: Routledge.
- Rüländ, Jürgen and Astrid Carrapatoso. 2015. "Democratiz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Parliament and its Asia Relations." In Stelios Stavridis and Daniela Irrera, ed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7-219. Abingdon, UK: Routledge.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 Seah, Sharon, Hoang Thi Ha, Melinda Martinus, and Pham Thi Phuong Thao. 2021.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Searle, John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London, UK: Allen Lane.
- Severino, Rodolfo C. 2006. *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n ASEAN Community: Insights from the Former ASEAN Secretary-General*.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Shambaugh, David. 2018.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4): 85-127.
- SICC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20a. “Plain English Guide to the European Union-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sicc.com.sg/publications/free-trade-agreement-guides/evfta> (June 20, 2021).
- SICC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20b. “Plain English Guide to the European Unio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sicc.com.sg/publications/free-trade-agreement-guides/eusfta> (June 20, 2021).
- Söderbaum, Fredrik. 2016. *Rethinking Regionalism*.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öderbaum, Fredrik and Luk Van Langenhove. 2005. “Introduction: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7 (3): 249-262.
- Suse, Andrei and Jan Wouters. 2019.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The EU’s Mixed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3 (3): 395-415.
- Today. 2019. “Number of Radicalised Individuals on ISA Orders at Highest in 7 Years.”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number-radicalised-individuals-isa-orders-highest-7-years> (July 4, 2021).
-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2020. “UK/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vietnam-free->

- trade-agreement (June 31, 2021).
- UK Parliament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19. “8 EU - Singapor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719/cmselect/cmeuleg/301-xlix/30111.htm> (June 15, 2021).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202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 (May 30, 2021).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2021.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 38.” <https://unctad.org/webflyer/global-investment-trend-monitor-no-38> (July 16, 2021).
- UNCITRAL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021.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https://uncitral.un.org/en/working_groups/3/investor-state (June 15, 2021).
- Walt, Stephen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4): 3-43.
- Waltz, Kenneth N.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Illinois: Waveland.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2): 384-96.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71-81.
-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November 22, 2021).
- Wong, Benjamin. 2020. “Data Localization and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 (1): 158-180.
- World Bank. 2020. “Vietnam: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EVFTA.”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787> (May 30, 2021).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6. “Trade Policy Review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Singapor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s343_e.pdf (June 8, 2021).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0. “Trade in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services_report_e.pdf (May 30, 2021).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May 31, 2021).

